

国际制度
guojizhidu的de

建构主义
j iangou zhuyi
分析
fen xi



范菊华/著

f en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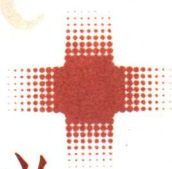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i

国际制度
guojizhidu 的 de

建构主义

分析



jiangou

zhuyi

范菊华/著

fen

X

贵州人民出版社

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制度的建构主义分析/范菊华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221 - 07667 - 0

I. 国… II. 范… III. 政治制度—研究—世界 IV. D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122 号

国际制度的建构主义分析

范菊华 著

责任编辑/禄佳妮

技术设计/禄佳妮

装帧设计/曹琼德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550001

印 刷/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890 × 1240mm 1/32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0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数/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21 - 07667 - 0/D · 470

定 价/27.50 元

作者简介

范菊华，1962年9月生于江苏苏州，曾先后获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史学与理论，主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读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

序

范菊华四年前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毕业，前些日子从苏州来信说他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了，我很为之高兴。在我的印象中，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的追求有着近乎虔诚的执着，也是国内较早就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制度的理论真正进行学理分析的年轻学者之一。《国际制度的建构主义分析》这本著作的问世，不仅是对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做努力的一种回报，同时也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学理积累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参照。今天来读这本具有浓郁思辨色彩的著作，我想就其价值而言有两点是应予以指出的。

一是关于对建构主义这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争鸣中脱颖而出理论流派的认识和评价。范菊华最初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建构主义学派的理论即使在它的原产地也是才被正式接纳，刚进入能与主流学派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学术殿堂。当时作者已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理论范式对于世界政治如何运转所特有的解释力，而如今，学术界已经鲜有人可以无视或忽略它的重要性的影响了，不管人们对这个新兴学派的理论本身持有怎样的观点。

理性主义的主流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基于经济学的视角,而建构主义则主要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作者在研读了大量国外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两者对国际制度安排的不同解释,厘清了建构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上的学理特点及其与理性主义主流学派的分野,正是由于它在本质上把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看作是一个“主体间性”互动的社会世界,强调认知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在国际关系构成中的重要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性主义在解释冷战后世界复杂的新问题时的不足。作者认为,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还有待于成熟,它所做的贡献是在重点探讨了被原来主流理论所忽略的那些因素和途径,而由于将文化认同论引进对国际关系的经验分析,使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和能动性在世界政治中得到了体现,成功地拓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野,因此这个分析框架所揭示的有关世界政治本质的知识并不比主流理论少。实际上,近些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表明,书中所分析的关于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和概念,已为一些其他理论流派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吸收,有的融入了原来主流理论的研究议程。显然,建构主义的兴起是以我们称之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的现实背景作呼应的,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术史的变迁来看,它与其他流派交相辉映,一起构成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多样化的图景。

二是关于对国际制度理论的理解以及它的现实启示意义。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制度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种流派围绕着国际制度研究这条主线展开了一拨又一拨的学理辩论,因此或可以说,国际制度研究的水平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今国际理论学理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国际制度力量的崛起已是当今国际社会

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它不仅影响着国家的内外政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一定意义上塑造着当今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因而人们预言，国际关系的制度化，通过国际制度来规范和处理包括国家在内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将成为一种世纪性的趋势。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范菊华把国际制度的建构主义分析作为他的研究题目，具有一定的前沿性。

我们知道，主流理论坚持以理性选择为路径，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制度安排是权力结构与分布决定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强调国际制度安排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它们把权力和利益的变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两个经典概念）看作是制度变化的原因。实际上，这种将国际关系中的物质因素作为变量的分析本身并非不能成立，但问题是它排除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或者将其置于从属的地位，这就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在建构主义看来，世界政治应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关系，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认知实践和社会互动才能在这里获得意义，因而与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它以社会化的选择为路径，把理念看作是权力和利益不可替代的核心变量，行为体的偏好、遵守的规范乃至拥有的身份，都是在主体间性的范畴内互动建构起来的，而且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发生变化，理念因素是理解国际制度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实现安排和发生变化的关键。作者认为建构主义代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维度，并在书中就建构主义对国际制度理论的学理贡献进行了相当充分的阐发与肯定，但作者仍不失兼收各家之长的中庸之道，他的结论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相互借鉴、物质目标和理念指导的相互结合、经济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的相互渗透。这个见解对于我们把握国际制度的理论研究前景无疑是有学术参考价值的。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并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

念。中国自觉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一方面是基于对自身身份(包括历史经验和国情)的定位,同时也是基于对世界大势和当今国际体系与时俱进的判断。中国已通过参加世界上大多数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积极参加者和建设者。毋庸讳言,目前大多数国际制度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来凭借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优势建构起来的,存在着更多地反映了它们利益的问题,但因此而采取彻底拒绝或摧毁的办法并不现实,而且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各国的自身利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既要善于利用国际制度的通行规则发展自己、保护自己,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创新,使之朝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而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际制度的建设,将贯串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个过程。这就需要了解和把握国际制度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轨迹。范菊华关于国际制度的建构主义分析所做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国际制度建设的实践的自觉性,其现实启示意义即在于此。

是为序。

朱瀛泉

2006年12月于南京

导 言

对国家间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努力自古有之。在东方,古代中国的孔子、孟子、墨子和商鞅的文章,以及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Code of Manu)和考提尔亚(Kautilya)的著作中都已隐含了国际关系思想的萌芽。在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阿奎那,以及近代的马基雅维利、格老秀斯、博丹、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思想。^① 但他们对国际关系的论述大多零星地散见于有关历史学、政治学、地理学、哲学和法学的著

^①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iti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001, pp. 8 - 13; Kenneth W. Thompson,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不知何故,汤姆逊在这部著作中遗漏了修昔底德,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忽和遗憾。斯坦利·霍夫曼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雷蒙·阿隆的《和平与战争》和肯尼斯·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列为两千年来国际关系分析的三部最伟大的经典。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1页。

作之中。由于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对国际事务具有什么性质,研究国际关系可以采用什么方法和建立国际理论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等问题,人们从来就都没有过一个统一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为了避免战争,有必要对战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时,国际关系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成员是国际法学家和外交史学家,他们大多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主要是国际联盟)出发去研究国际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很少提出科学的实证主义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在美国学界的推动下获得了迅猛发展,对国际关系在理论上进行系统论述的文章和专著不断涌现,国际关系理论也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可见,虽然国际关系学这门学科源远流长,但相对而言仍是“学术殿堂里的新来者”^①。

^① Kenneth W. Thompson,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major 20th century theorists and the world crisi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xi.

自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一直交替主导着西方国际事务的理论研究和国际关系的实践活动,它们也成为国际关系学理论争论的主要对手。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之争,^②以及由此演化而来并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成为争论主角的“新新综合”或“新新之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被普遍视为是“范式内争论”(inter-paradigm

① 在哲学中,“现实主义”要解决的是,是否存在某个事物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世界的问题,独立于我们如何了解世界或涉及这个事物的表述,意味着存在什么等这样的问题。按照这个观点,存在着许多发生在过去的、所有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的、我们仍然未知的真相。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意味着许多事物,部分原因是那些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的学者涵盖了一个广泛的思想集合”,(cf. Lucian M. Ashworth, “Did the Realist - Idealist Great Debate Really Happen?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1, April 2002, p. 35.)但现实主义者都反对理想主义的观点,认为应该按照国家收益解释国际行为,而不考虑国家承认的或观察者心中拥有的道德情感和期望。它是一种科学的传统,一种有意识地把科学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企图。

“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理论学说,又是一个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思潮,它是17、18世纪天赋权利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到了19世纪,它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在大不列颠,它的核心是,政府受法的约束,从而保证公民所享有的个人自由;在欧洲大陆,它要求按照理性的原则对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精心的重建。在经济上,它代表一种国际贸易的观点,反对对国家间的贸易活动进行任何限制;在政治上,它反对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束缚。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这一术语除了指称一种对新观念的开放态度以外,其含义可谓是纷繁各异,几无相同之处。因此,虽然可以说有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存在,但它没有像现实主义那样用一种系统的方式公开阐述过。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许多理论的集合;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上能验证的原则,不如说是一个观点。自由主义国际理论类似于一组不断移动的目标,所有这些目标都表达了其进步的观点。

② Ray Maghroori, “Introduction: major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ay Maghroori and Bennett Ramberg (ed.), *Globalism Versus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rd Debate*, Westview Press, 1982, p. 9.

debate)^①。虽然这些争论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事务的思考方式,同时被一部分人认为已经有效地详尽无遗地论述了所有国际关系问题,但问题是范式内的争论绝对不可能覆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处理的任何问题。结果,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逐渐呈现出相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开始向理论范式多元化、多视角、多视野转化。被视为边缘学派的非主流理论也迅速发展,如批判理论^②、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规范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等纷纷向主流理论发起挑战,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和实质内容都提出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质疑,对以实证主义和经验方法获得国际关系知识的路径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清算。这些在学术上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争论。这次争论在国际关系理论

①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1, p. 225.

② 也有学者把后现代主义、女性理论、规范理论、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边缘理论统称为批判理论。Cf.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95, pp. 5 - 49;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 70; Steve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tia Zalewski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6, p. 12.

发展史上一般被称为“第三次争论”。^① 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的和平方式,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变化,削弱了主流理论,特别是把两极格局看作国际体系稳定之基础的新现实主义的可信度,也给学者提供了反省和批评性的自我评估的机会,从而极大地推进了这种多元化、多视角、多视野的竞争。虽然争论或竞争仍在继续,各种范式孰优孰劣尚未有最后的定论,“两新”主义的主流地位仍未受到真正的撼动,但这种争鸣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完善。

二

在思考世界面临的新问题时,我们需要用超越传统的国际关

^① Cf. Ray Naghroori and Bennett Ramberg (ed.), *Globalism Versus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rd Debate* Westview Press, 1982; 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 - Positivist Era",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tember 1989, pp. 235 - 254; K. J. Holsti,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ich Are the Fairest Theories of All?"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tember 1989, pp. 255 - 261; Thomas J. Biersteker,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st - Posi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tember 1989, pp. 263 - 267; Jim Geor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Thinking Space: Another View of the Third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tember 1989, pp. 268 - 279. 但是也有学者质疑“国际关系理论正处在第三次争论中”的观点,认为“第一次争论”是有关人性的“保守的”立场和“革命的”立场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辩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延伸,这场争论目前还远没有结束;“第二次争论”是有关人类知识的理性主义观点和非理性主义观点之间的更一般更古老的哲学辩论的一部分,这场争论永远不会失去它的重要意义。Cf. Emmanuel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 2001, pp. 611 - 625. 当然,这次争论的几个发展阶段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争论是逐渐演进的,各阶段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标志,关于这次争论更详尽的论述请参阅本文第三章第二节。

系、地缘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的观念。新问题呼唤着新方法、新视角、新视野、新思维和新理论。与时俱进是一切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应该且必须具备的要素。现实需要是任何理论之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现实的变化,传统的理论都会遇到一些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新问题,那么对传统理论的修正就成了必要。当然,修正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取代,而是为了发展和完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不例外。冷战时期,现实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原因是“它对战争、联盟、合作障碍和其他国际现象提供了简洁且有力的解释,它对竞争的强调符合美苏互为敌手的主要特征”^①。但非常遗憾,现实主义,以及由此修正而来的新现实主义,和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主流(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没能预测,也无法合理地解释世界政治中的这场重要革命——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同时,在解释和预测冷战后的国际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和国际关系现实的深刻变化时,所暴露出来的缺陷越来越明

^①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in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ring 1998, p. 31.

显,且难以接受,^①而在这些缺陷之处,建构主义的解释则显得比较有说服力,所以它能够在冷战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取向。当然,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之上的发展。

早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种问题的相互依赖性和全球性日益凸显,现实主义解释乏力的迹象业已显露,自由主义以新的面貌再度兴起。新自由主义^②相互依赖理论是这种兴起的代表之一。近年的全球化浪潮在本质上只是以前相互依赖趋势的继续。罗伯逊(Robertson)认为全球问题有主客观二元性,“全球化指的是世界变得紧密(compression)和把世

① John A. Hall and T. V. Paul, “Preconditions for Prudence: a sociological synthesis of realism and liberalism”, in 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7. 虽然冷战的结束使得少数学者宣称现实主义注定要成为学术的垃圾堆(scrapheap),但涉及其死亡的流言显然是哗众取宠,夸大其辞。Cf.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in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ring 1998, p. 35. 一般来说,科学理论是客观实在的描述,具有真理性,但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对客观实在的某一方面、某一部或某一层次的描述,所以必然具有片面的真理性或真理的相对性。在一个科学理论中,真理与错误可以统一或并存,还可以互相转化。另外,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具有主观意志,所以国际关系研究所发现的许多规律更是只适用于一定的时期,难以成为永久性的规律;只适用于解释国际问题的一个层面,难以解释所有层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原理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反映。社会建构主义重视的正是这种相对性。

②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经历了四个阶段: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1940s—1950s),新功能主义区域一体化理论(1950s—1960s),相互依赖理论(1970s),新自由制度主义(1980s—)。Cf. Joseph M.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4. 但它们并非相互替代,而是或并行不悖互存共处,或从特殊的角度修正、补充或发展已有的理论。作为一个与新现实主义对峙的学派,它的名称直到1988年约瑟夫·奈在《世界政治》杂志撰文首次使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才确定。Cf. Joseph S.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World Politics*, Vol. XL, No. 2, January 1988, pp. 235-251.

界作为一个整体意识的加强(intensification)”^①。人们把全球相互依赖本身的加强称为客观性相互依赖。与此相对应,主观性相互依赖指人们对这种相互依赖的意识的增加。因此,相互依赖理论,特别是对主观相互依赖的研究,已经具有了建构主义的气息。到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制度理论逐渐兴起,但是许多学者对国际制度的研究也已包含了建构主义的成分。规范概念就是通过国际制度被引进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制度的定义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② 约翰·鲁杰(John Ruggie)认为“国际行为是制度化的”^③,所以,在解释战后经济秩序时,把“合法的社会目的”提升到与霸权力量同样重要的位置,把社会结构提升到具有重要的构成性力量的地位,认为要理解战后国际经济制度,必须承认美国霸权力量中“镶嵌”着自由的规范和价值这个事实。^④ 唐纳德·柏奇拉(Donald Puchala)和雷蒙·霍普金斯(Raymond Hopkins)认为接受规范性上层建筑的存在是理解殖民主义和有关国际粮

① Quoting 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Sage Publication Limited, 1994, p. 196.

② cf.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③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 an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3, Summer 1975, p. 559.

④ cf.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95-232; or “Embedded Liberalism and the postwar economic regimes”, in John G.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62-84.

食交易的关键。^① 厄斯恩特·哈斯(Ersnt Haas)在研究中注重认知过程,指出在国际制度中产生的共享经历和共同理解是国际结果的决定因素。^② 不过,由于主流学派的自大和自负,对这些研究采取了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有意贬低的态度,并不与之进行对话或辩论,所以建构主义一直处在边缘的地位。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把对建构主义的分析,与对国际制度的分析结合起来,是学者对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不满,力图寻找更深入全面的分析,而进行的一种理论回归。

这里选择建构主义的视角对国际制度形成的路径进行分析还有另外三个原因。第一原因是这个分析在学术上有着重要价值。建构主义的文化认同论作为一种与研究国际关系的传统的主导路径不同的理论方法,代表着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一个“新”维度。当然“新”的未必是好的,但“新”的至少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样的研究,特别是与“旧”的进行比较的研究,能够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建设。另一个原因是研究国际制度,首先必须研究国际制度安排是如何实现的,因为国际制度安排的方式是理解制度属性、维持、变化和作用等其他方面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是不可能很好地对其他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所以对制度如何形成的分析“在制度分析的议程上还将占有一段时间”^③。第

① cf. Donald J. Puchala and Raymond F. Hopkins,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1 - 92.

② cf. Ernst B. Haas, “Words Can Hurt You; or, Who Said What to Whom about Regim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3 - 59.

③ Peter Mayer, Volker Rittberger and Michael Zürn, “Regime Theory: State of the Art and Perspectives”,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3, p. 417.